

■ 学人素描

青木昌彦：“内部人控制理论”缔造者



◎ 史晨昱

随着青木昌彦著作的不断翻译和问世,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熟悉这个一头银发的日本学者。他是“内部人控制”理论的缔造者,又是比较制度理论大师,对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青木昌彦著作的不断翻译和问世,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熟悉这个一头银发的日本学者。他是“内部人控制”理论的缔造者,又是比较制度理论大师,对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比较经济学开创制度分析新视野

20世纪80年代曾繁荣一时的比较经济学,因其内在缺陷及苏东巨变而一度陷入沉寂。但在苏东解体后的经济转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欧元统一、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大事件发生后,在传统的废墟上又浮现一个崭新的领域——新比较经济学。新比较经济学从原先宏观的体制视角转为微观化的制度视角,从原先偏重于体制的一般性研究转向对制度的系统性和特殊性分析,从原先流于空谈转为注重可操作性。

新比较经济学中最重大的研究方法创新体现在以青木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CIA)“学派”上。他们采用众多新理论,如组织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对制度问题展开深入分析。

青木赞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是重要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意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定义为“博弈规则”的看法。但是,青木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

在对制度的分析中,他确立了博弈分析的基本单元(即域),认为域是由参与人集合和每个参与人在随后各个时期所面临的技术上可行的行动集组成,参与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组织。青木把博弈域概括为六种类型:即共用资源、经济交换、组织、社会交换、政体和一般性组织领域。各种域是相互交叉和相互影响的,这又说明制度是相互关联和互补的。在此基础上,青木给出了一个更具体的概念: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

青木昌彦:他是“内部人控制”理论的缔造者,又是比较制度理论大师,对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比较制度理论方面,以青木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CIA)”学派采用众多新理论深入分析制度问题,开辟了新比较经济学的新研究领域。

他在公司治理理论方面也贡献卓越,并因首倡“内部人控制”概念而闻名于世。

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持系统。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策略决策相关的。这样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

青木提倡用更符合现实性的进化博弈论来研究制度的演化变迁。进化博弈论放松了博弈论的约束条件,并认定人是有限理性的。制度的形成既可以是自发秩序的产物,也可以是人为秩序(人为理性构建)的产物。从表面上看,二者具有明显的差异。但青木认为,从进化博弈的角度出发,这两种制度变迁机制的差异并不明显。它们在发生变化时有着共同的条件:在起初的政治博弈中,需要有达到临界规模的参与人修正他们关于域内在结构方面以及外在环境的表征信念,并以协作或分散的方式共同采纳能产生新均衡的新策略。因此,对于这两种制度形式的变迁,完全可以根据内生博弈规则的制度观认定其为一般制度变迁即相当于博弈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其结果不仅是参与人行动策略的整体变化,而且是共有信念的变化。

青木进一步分析认为,在旧制度危机下寻求新出路的过程中,参与人可以利用各种预示未来博弈规则的信息,比如他们可以模仿在其他域已经成功的做法,从国外经济域的先进经验中触类旁通,吸取经验。究竟哪一种信念系统最终成为预期收敛的聚焦点,进而成为一种新制度,主要取决于学习、模仿、适应和惰性如何在相关域之间相互作用。

青木认为,从单个域的制度变迁转向经济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变迁,问题将会复杂得多。制度转型过程的长短和激进程度取决于考察的相关域的范围。转型过程通常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相对短而混乱的制度危机阶段,其中急速的环境变化(或内部危机)引发了超过临界规模的参与人的认知危机,各种变异性决策以一定规模进行着试验;另一个是各种决策均在“进化选择压力”的作用下接受进化考验的阶段。随着某些决策在进化过程中逐渐上升为主导地位,后一时期最终和制度稳定阶段汇合在一起。

青木强调,为了解特定的制度

创新性剖析导致公司治理结构多样性的原因及其影响

在公司治理理论中,青木因首倡“内部人控制”概念而闻名于世。由于“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存在,公司治理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与以往文献相比,青木不是试图去设计最优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经理激励合同,而是试图理解公司治理结构多样性的原因。

青木将影响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各种重要因素归并划分为组织域、金融交易域、劳动交易域和政治域。他从组织域的信息结构入手,通过分析组织域和金融交易域的制度关联及与劳动交易域和政治域之间的制度互补性,深入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多样性的原因。

青木把组织域看作组织内部不同任务单元信息加工的分配,是由上级与下级的垂直信息关联和下属不同任务单元的水平信息关联所构成的一组关系。他将信息关联的一般模式区分为层级分解、信息同化和信息包裹。以这三种一般模式为基础,青木昌彦对信息结构进行了分类,与传统的美国、日本、德国的组织模式相对应的信息结构分别为:功能层级制、水平层级制和参与层级制。

青木认为,特定类型的组织域面临特定的治理问题。他把人力资产区分为个人型和背景导向型人力资产。在层级分解中,为了适应分工清楚的信息加工任务,人力资产必须是个人型的,治理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拥有不同个人型人力资产的参与人中,谁应该控制物质资产的支配权;对于信息同化模式,参与人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共享信息和相互影响,以至于组织收益很难清晰分解到个人的贡献,参与人在积累和使用人力资产时会萌生搭便车的动机,问题在于如何治理搭便车问题。当企业组织嵌入在金融交易域和其他域的互补性的制度安排中,组织治理问题就转化为“公司治理”问题。他将公司治理结构界定为公司组织域控制利益相关者(投资者、工人、经理)相机行动决策的自我实

施规则,特别注意组织域和金融交易域的制度关联以及与其他互补域的制度约束(即制度互补性)。

青木认为,公司控制市场治理结构只适合功能层级的信息结构。在该信息结构下,经理进行市场导向型的决策,工人从事互不相同的操作性任务,对应的人力资产是个人技能。由于经理的系统性信息加工任务至关重要,因此让经理占有整个物质资产是最优的所有权安排。当所有者需要外部融资时,组织域就与金融域联结起来,他把治理结构界定为这种关联在不同条件下的均衡结果。当工人工资通过外部竞争性劳动市场定价,他们的报酬可以事前决定,因此支付合约要素报酬后剩余最大化和组织内部效率一致的,公司的剩余索取权被股东拥有公司的目标是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

当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是社会契约的社团主义国家形态,标准化职业的工资水平由整个社会范围内谈判决定时,企业雇主利用与企业业绩挂钩的工资合同鼓励工人努力工作的能力受到限制,相应地,工人也很难难以辞职相威胁要求更高的报酬,这时让工人分享剩余控制权,共同治理

构成一种均衡,组织结构也内在地从功能层级转为参与层级制。在这种信息结构下,当面临资金约束时,无论是企业所有者还是工人都偏向债务融资。他认为,股东治理和共同决定机制是组织域和金融域关联博弈的多重均衡,是无法按照帕累托准则进行一般的排序,哪种均衡会出现,既取决于历史的因素,也取决于面临的制度环境。

水平层级的信息结构面临的是参与人搭便车的道德风险问题。在这种组织结构下,如果经理和工人相分离,他们的人力资产价值因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而贬值。青木构建了关系型相机治理机制:控制权依据企业产出在企业内部(经理和工人)和投资者的共同代理人之间转移,分为内部人控制区域、监督者控制区域、救助区域和企业解散区域。由于企业成员拥有的是背景导向人力资本,一旦企业解散或倒闭,企业成员预期未来收入要减少,这样就会驱使成员更加努力工作,从而缓解了水平层级内在的搭便车问题。青木昌彦将这个抽象的模型运用到对日本公司治理结构(即主银行结构)的分析中,并获得了令人信服的实证分析结果。

■ 本期人物话语



要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改变以药养医局面

吴仪(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组长)11月30日在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第三次现场会议上表示,搞好药品安全监管工作,还要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从根本上规范药品采购和用药行为。

■ 多声道

应放慢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节奏

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11月28日在2007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表示,应该放慢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节奏。中国企业要在利用全球资本市场时要注意对投资者的选择,要考虑能够为企业的品牌、资源整合、技术专利等进一步打入国际市场带来好处。同时,要考虑在不同市场的上市成本、上市效率和时间。

明年美国经济增速将为2.5%

查尔斯·埃文斯(美国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11月27日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期货行业协会第23届年会上表示,美国的通货膨胀正在出现下降的趋势,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美国通胀水平将从前几个季度2.5%的水平降到2%左右;同时,美国良好的就业情况也将为国内消费提供支持。目前美国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实现其两大目标——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保持价格水平稳定,这将有助于金融市场良好运行。尽管美国经济今年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但鉴于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良好,美国经济出现整体衰退的可能性不大,预计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将保持在2.5%的水平。

要从多方面提高金融机构竞争力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11月29日举行的中国论坛:实现可持续发展—融资和投资机遇”上表示,随着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的提高,国内金融机构面临的竞争程度已经不是单纯国内市场可比的,必须开拓视野,提高衡量竞争力的标准,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除了政府通过政策努力营造创新环境外,金融机构本身的创新意识也需要大幅度提高。金融机构要提升可持续竞争力,就必须加强风险管理和控制的能力,特别是应对经济周期风险的能力。此外,金融机构还必须加强对不同产品的风险定价能力。因此,要实现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

今年有70%概率不会再加息

哈维铭(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11月29日在由新加坡商会和上海恩越思企业管理咨询(SHEN)主办的商业论坛上表示,由于预计未来两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将持续下跌,美国居民个人消费与真实房价联系紧密,房价持续下跌将给美国经济造成深远影响,并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速有所放缓。预计出口增速的放缓将使国内通货膨胀得以缓解。所以,今年有七成把握央行不会再次加息,明年最多加息54个基点。同时,由于美元贬值趋势将在2009年才能见底,预计明年人民币兑美元将加速升值,人民币加速升值不仅能够抑制通胀,而且抑制未来的升值预期,降低整个人民币升值周期内涌入的热钱总量,维护金融稳定。

■ 经济学家学问故事

陈豹隐:中国翻译《资本论》第一人

◎ 梁捷

今天的绍兴路7号是上海文艺出版社,70多年前曾是中华学艺社旧址,也是上海思想文化界活动的重地之一。

作为中华学艺社的三个核心成员,陈豹隐、周昌寿和郑寅文是上世纪初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时的同学。他们组织起一个社团,还办了一份《学艺》杂志,并为学术翻译和传播建立了最初的规范。

中华学艺社的前身是“丙辰社”,《学艺》一开始也叫《丙辰》。民国五年,也就是丙辰年,还在读书的陈豹隐联合了周昌寿和郑寅文等人发起了丙辰社,宗旨是“研究真理,昌明艺术,交换知识,促进文化”。

据说,李大钊最初也是组织者,后来提前回国,工作就全交给陈豹隐等人。陈擅长组织,很快就有一批留日学生聚结在周围,其中包括马君武、郭沫若、张资平等,甚至梁启超、蔡元培等都成了当时的名誉会员。

丙辰社主张传播新知。周昌寿是最早熟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中国物理学家之一,他在《丙辰》上多次介绍相对论,并翻译了日本学者石原纯所著的《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原理》。五四运动以后,相对论思想已广为中国学者所知。

郑寅文在东京帝国大学读的是化学。他在读书时就注意到了化学名词的命名问题,做了大量笔记积累,回国后写出专著《无机化学命名草案》,继承前辈学者徐寿所定的部分命名,做出很多扩展。比如他按照原定的物理状态,将气态元素加“气”字头,液态加“液”部首,非金属元素加“石”字旁,金属元素加“金”字旁以示区别,这套规则一直沿用下来,为中国人学习化学带来极大便利。

陈豹隐是四川省中江县人。原名陈启修。他出国甚早,在日本呆了十余年,方向是当时比较冷门的经济学。1914年,还在读书的陈豹隐翻译并在上海出版了小林丑三郎的《财政学提要》,主要介绍了基本的财政学理念,深受大家欢迎。随着陈豹隐有缘在东京帝大遇到马克思主义一代宗师河上肇,他的研究兴趣就逐渐转向更宏观的社会经济深层问题。

五四运动前夕,丙辰社员陆续回国并迁址到上海,更名为“中华学艺社”。陈豹隐于1919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担任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资本论》的研究导师。他在北大与李大钊等人交往密切,我们在《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专号”上曾看到他的名字。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和《资本论》虽然刚刚进入中国,但影响最大,人人都在争相讨论。李大钊和陈豹隐的演讲吸引了无数学生。同时,陈豹隐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先后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担任第四期政治讲师,也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北伐时,陈豹隐更是担任了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委员。

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给中国学术界造成极大震动。换一个角度,倒也可以说这次革命失败给中国学界造就了不少人才。比如,陶希圣在革命失败后回家潜心治学,数年后变成了中国政治史专家;又比如王亚南,在革命失败后出国留学,成为经济学翻译家。陈豹隐在革命失败后马上流亡日本,继续自己的学习写作生涯。

尽管陈豹隐在日本的读书生活极为刻苦,但他一有空就翻译马克思主义论著。在1927年12月至1929年7月期间,他出版了包括译著在内的百余万字著作,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在这一时期里,他还与鲁迅、茅盾和张资平等文学家往来密切,甚至还写过小说,翻译过高尔基等文学作品。如果将他在1949年以前发表或出版过的著作来看,总数约有70种之多,至于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那就多得难以计数了。

其中,陈豹隐比较出名的著作有《财政学总论》和《经济学大纲》。前者是他多年研究财政学的成果,代表了当时财政学研究的较高水平。后者是他翻译了河上肇的那本通俗易懂、简明实用的《经济学大纲》,很多革命青年就是读了这本书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陈豹隐也忍不住说,这本书作为大学经济原理的教科书来看,实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的良书。

1930年,陈豹隐在日本独自译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主题为“商品与货币”,并作为《资本论》的第一分册出版。这是《资本论》中最为基础又最难理解的部分,遇到实在难译的地方,陈豹隐就另辟蹊径,加上自己的见解——“陈注”,方便读者参考。

陈豹隐后来没有精力继续翻译,回国教书去了,1960年在成都逝世。潘方舟、侯外庐、郭大力、王亚南等后继学人在陈豹隐的工作基础上继续努力,终于完成了3卷本的《资本论》翻译。

陈豹隐在读书时就认识的老朋友郭沫若一直对《资本论》很有兴趣,1930年前后也差点着手翻译,直到看了陈豹隐的译本才作罢。据一些学者说,现今日本东京三鹰市亚非文化图书馆,在其“郭沫若文库”中尚陈列有陈豹译1930年译的《资本论》,误认为陈启修为郭沫若的化名。

各种研究都表明,陈豹隐是中国翻译《资本论》第一人。

■ 美加观潮

是谁杀了鸽子?

◎ 何祖

在加拿大城市的街道上,你会经常发现有鸽子被汽车轧死。先是觉得惨不忍睹,后来一想觉得匪夷所思。后来又发现,这儿的鸽子个个膘肥体壮,不善飞翔。因为几乎没有天敌,人们又友善待之,长此以往,鸽竟不鸽了。

在公园里政府管理挂着“DO NOT FEED THE BIRD”(禁止喂鸟)牌子,但我还是看见许多老人边晒太阳边向鸽群洒玉米粒儿。有时,你在人行道上骑自行车会发现鸽群在你面前徜徉,根本不把你当回事,挥之不去。更可气的是,原来我们大楼的车库屋檐下有许多鸽子栖息,弄得门口鸽粪狼藉。于是物业管理公司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假猫头鹰装在上面,可是好了没几天,鸽们发现了那玩意儿不是真的,就站在猫头鹰头上拉屎拉尿,整个是“猫头养粪”。后来我总结出来一个道理,不是车子杀死了鸽子,而是鸽子自己杀死了鸽子。如果一种生物在没有天敌和过于娇

宠的环境中生长,早晚失去自卫能力、竞争能力,甚至生存能力。

鸽子如此,人亦如此。前段时间我写过一篇关于加拿大“粥棚”的文章。描述了在加拿大慈善救济机构主办的食堂里的见闻。为写文章我做了些调查,并吃了几次免费午餐。发现享用免费就餐的人中90%以上是当地的白人。其中,许多人是流浪者,也有一些是低收入者。在餐桌上他们往往显得很有绅士风度。比如,服务者送上了食品他们一定会言谢,并加一个“Sir”字。

我有时很奇怪,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找工作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首先是他们没有语言问题。在排队等候的时候,他们中许多人都在看书看报,有个别人的着装让你觉得他就是一个教授。而中国移民为什么找工作难,首先就是一个语言问题,有的人甚至一辈子没有学好英语。你在唐人街会看到许多操广东话的华侨,他们就是不会说一句像样的英文。这几年来,大陆新移民更是痛感语言关之难过。有的人尽管读出了硕士和博

士,但一开口还是一口中式英语。他们中很多人甚至不敢接家里的电话,而让在这里出生或受教育的子女接。

有一老人家曾说过一句话:外国语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真是切中肯綮。他老人家尽管智商超人,但外国语,不管是俄语还是英语,都没学好。然而,作为英语是母语的流浪者,他们宁愿像鸽子一样活着,靠人们的施舍,靠政府的补贴过着风餐露宿、席地幕天的日子,也不愿意去找份工作自食其力。同时,他们并不因为目前的处境而降低对生活的要求。

于是我想起了中国的古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现在面临的国际国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坏事。我们的生命力会随着竞争能力的增强而更加蓬勃,正所谓人在虎豹丛中健,月在峰峦缺处明。只是我们必须放眼长远,不要做杀鸡取卵、贻害子孙、急功近利的事。卧薪尝胆,牢牢把住可持发展这个经济发展的命脉,就一定能够再造辉煌,屹立于东方。